

一部古籍的逆袭

曹菁菁

汉武帝当了十几年皇帝，正风风火火搞国家建设的时候，有一天，他的哥哥鲁恭王刘余来信说家里出了一件大事。据刘余同志陈述，他觉得自己在曲阜的王宫太寒酸了，打算扩建一下。左看右看看上了隔壁的孔子老宅，货真料实。考虑到孔子他老人家不在了，后人住这么大的宅子也浪费，刘余就带着拆迁队上孔子家挖砖去了。几镐子下去，不得了，墙是空的，里面还有一堆堆的竹简呢！他觉得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，必须向皇帝汇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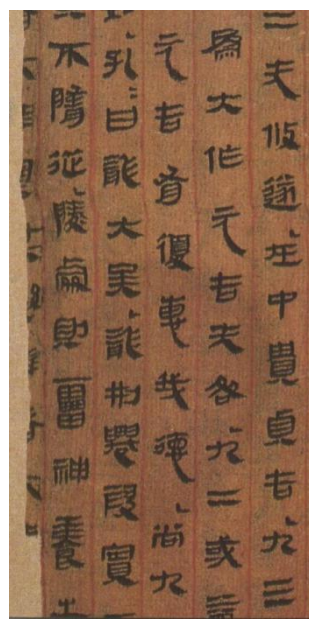
刘余同志政治觉悟很高。他寻思着，自从老弟刘彻当了皇帝以后，对文化很重视，尤其注重儒家文献的收集。他们的老大哥，河间献王刘德，前些年带着从民间搜集来的各种书籍去长安献宝，很是得到了皇帝弟弟的夸奖。如今，他从孔子家里挖出了古籍，这怎么看，也比河间献王那些个野路子书籍有逼格啊！他孜孜地让人把竹简拿过来看看，这一眼看去，刘余的内心崩溃了：这上面都写了些什么鬼？！（不是贵为王爷的刘余不识字，从战国时期经秦朝到汉代，文字的变化确实有点大，我们来感受一下。）



荆州出土的楚国版《缙衣》



睡虎地出土的秦代书简



马王堆出土汉代《周易》

孔子的十一世孙孔安国听说自己的祖宅里挖出了曾爷爷(孔子第八世孙孔鲋)

的藏书，激动得几宿都没睡好觉。他找到鲁王刘余，说：这都是战国时代的古文献籍，放着别动，我来！经过孔安国的整理和研究，发现这些古籍分别是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。于是，鲁王使者带着孔壁之书，孔壁之书带着孔安国，大家一起上长安见皇帝去了。

孔子老宅出的这些个古籍中，《尚书》《礼记》是孔子奉为经典的经典；《论语》是孔子语录，也是经典；只有《孝经》资历浅，不受待见。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仪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，号称“五经”，是孔子推崇的古代经典，儒家学问立本的典籍，《孝经》比不了。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荀子》是先秦儒家三巨头的语录和著作，儒家指定阅读书目，《孝经》还是比不了。《孝经》大概产生在战国晚期，如果不出什么乱子，产生地点也大致就在鲁国境内。当地的儒生把“孝”和“忠”当作论点，从《左传》《孟子》《荀子》里找了一些话，编辑编辑，适当地加几个“夫子曰”，就把著作权含含糊糊地扔给孔子了。

汉武帝的时候，朝廷给儒家“五经”的研究工作设置了五种公务员编制：《诗（经）》博士、《（尚）书》博士、《春秋》博士、《易》博士、《（仪）礼》博士。可儒家古籍那么多，研究别的书怎么办？朝廷答曰：研究是可以的，不过朝廷不拨款不管饭。研究《论语》都不管饭，研究《孝经》更要自己吃自己了。所以孔子老宅出土的《孝经》也只好呆在未央宫无人问津。

《孝经》这部书，好就好在它力求推广一种人人都应该具备的美好品德——孝。“夫孝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人之行也”。孝，乃诸德之本。东汉光武帝觉得这本书太重要了，下令儒生好好学习。他的儿子明帝更是将《孝经》推广到基础教育中去——“复为功臣子孙、四姓末属别立校舍，搜选高能以受其业，自期门羽林之士，悉令通《孝经》章句。”《孝经》一跃成为和《论语》一样的儒生必读书目。

虽说《孝经》在全国普及开来，但是因为出身不太好，在太学中一直没有什么地位，既没有立为官学，更没有设置博士。东汉光和六年（183），太学里竖起了46块巨大的石碑，上面刻着诸经博士写定的儒家经典，供太学生们学习，它们分别是：《鲁诗》《尚书》《周易》《春秋》《公羊传》《仪礼》《论语》。此时此

刻，《孝经》只能蜷成一团仰望着经典中的大哥们。



西安碑林竖立的碑石，如同太学石经一样威严

但，《孝经》没有自暴自弃。自东汉以来，它一直兢兢业业地扮演自己基础教育课本的角色，收效显著，群众基础好。就这样过了几百年，唐太宗兴科举制，为寒门子弟入仕大开方便之门。科举嘛，考试是一定要的。其中有一类考试叫做“明经”，要求应试者在通晓儒家传统“九经”之外，兼通《论语》《孝经》。终于和老大哥们站在同一个殿堂里了！《孝经》小弟感受到了满满的幸福。

你以为这样就是《孝经》“书”生的巅峰了？OF COURSE NOT. 套路不会就是这样的。

在歌舞升平的开元盛世，《孝经》等来了自己命运的大反转。唐玄宗李隆基同志对《孝经》有迷之眷念（请不要问为什么，我不想写另一篇论文），要在国子学里立《孝经》为经典。彼时，《孝经》有两个版本系统，一个是我们上面提到的、孔子老宅挖出来的、孔安国整理的古文本《孝经》，共二十二篇；另一个是西汉鲁地儒生自有传承的今文本《孝经》，共十八篇。唐玄宗就对儒生大臣们说：你们选一个标准本出来。于是，太子右庶子刘知几同志率领的古文本《孝经》粉丝团和国子祭酒司马贞同志率领的今文本《孝经》粉丝团展开了一场大辩论。辩论结果是司马贞同志胜出，今文本《孝经》选为标准课本。唐玄宗又说：课本选好了，讲义我们也要改一改，今文本《孝经》的郑玄（荀昶）注不好，不深刻，我看还是得我亲自来写一写。

不管别人怎么想，唐玄宗自己是本着很严肃的学术情怀来做事的。开元十

年（722）六月，唐玄宗写完了《孝经》的注，颁布天下与国子学。但这不算完，他对自己还有更高的要求。天宝二年（743）二月，唐玄宗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与沉淀，又出了《孝经注》重订本。玄宗对《孝经注》的新面貌很满意，国子学当然也非常满意。天宝四年九月，御注本《孝经》被刻在四块巨石之上，立于太学，世称“石台孝经”。在太学这片江湖之中，从小弟到大哥，从仰望到平视，我已经感受到了《孝经》此时此刻汹涌澎湃的心情。

由于这是唯一一部皇帝亲自钻研注释的儒家经典，所以《孝经》在儒家经典大排行里坐稳了交椅。到了宋代，《孟子》才终于上升到经书的地位，排在了《孝经》的后面。北宋仁宗嘉祐元年（1061），开封太学立起了九种石经，分别为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周礼》《礼记》《春秋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《孟子》。北宋之后，用石经公布太学标准课本的做法渐渐式微。因为自南宋始，雕版印刷技术已经十分发达，成本一再降低。这些儒家经典的标准本也渐渐以刻本的形式流布于世了。南宋晚期，贾似道和他的幕僚廖莹中立志打造儒家经典的“精装本”。廖莹中经营的“世彩堂”以北宋嘉祐石经的“九经”为基准，蒐集数十种版本的经典古籍加以校勘比对，又聘请百余人校正正文，态度非常认真。书版刊刻好之后，用抚州草抄纸和油烟墨印制成册，雪纸黑墨，再装潢以泥金书签，真是刻印本中的战斗机啊！哇，这么好的书，最后当然要先濒危再失传啊！



唐开成石经



北宋嘉祐石经残石拓本

元代时，廖氏世彩堂九经刻本就已经很罕见了。岳飞九世孙岳浚，也是学习儒经的修明之士，他根据世彩堂九经重刻了一套九经。由于每一册书里都刻上了“相台岳氏刻梓家塾”或“相台岳氏刻于荆溪家塾”的木记，所以这套岳氏九经

（含三传）又被称为“相台本”九经。

清代时，世彩堂九经已亡佚，就连相台本九经也是寥寥无几。乾隆皇帝好不容易求得了相台本的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礼记》《左传》《孝经》，将它们统统盖上“天禄琳琅”“太上皇帝之宝”的大印。又在昭仁殿后庑专门开辟了一间小室收藏相台本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礼记》《左传》原本，命名为“五经萃室”。然而，嘉庆二年（1797），乾清宫大火，昭仁殿遭殃，“相台五经”和天禄前编书一起，全都烧毁了。

所以，现在，只有逃过了“天火”大劫的天禄琳琅相台本《孝经》安稳地睡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书库里。

【好物介绍】

“天禄琳琅”之《孝经》高仿本

函套：32.3×21.7×3cm

书大：32.1×20.8cm



